

变山地坑道为“地下长城”

解析志愿军坑道战战术

■虞 勇 任利斌

“敌人构筑的坑道有的长达3000英尺(约914米),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无论空中或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在挖得很好的战壕里的敌人消灭……”这些无奈的话语,来自“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和美国陆军军史,它们从对手的角度,反映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坑道战的强大威力。

创造以劣胜优的奇迹。坑道战是抗美援朝阵地战中,我军保存有生力量的战场最优方案。1951年敌我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后,双方展开了长达两年零1个月的阵地战。美军在近战中吃了大亏以后,企图利用1500架战机的绝对制空权和优势炮兵火力扳回局面,疯狂轰炸、炮击我前沿阵地。前线不足0.1平方米的土地内,甚至可以挖出287枚弹片。在这种高强度火力下,一般的地表野战工事无法发挥战场掩蔽作用。

“既然天空是美国人的,我们就在地下想办法。”从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开始,志愿军战士本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自发在敌人进攻方向的背向山坡挖出防炮弹、防空袭的J形“猫耳洞”,后又将其深挖、连结,组成U形小坑道,进而形成猫耳洞、坑道、交通壕为一体的防御体系。敌人炮击、轰炸时,我军进去隐藏;待敌支援火力延伸、步兵接近时,我军就冲出来杀伤敌人,这就是志愿军坑道工事和战术的雏形。志愿军司令部发现坑道作业的优点性后,迅即号召全军“综合利用位于山顶、山坡、山脚以及平原和山区地带的胸墙、堑壕和坑道,开展建造开放式掩体和坑道枪(炮)眼的运动”。从1951年春起,“三八线”前沿的志愿军在司令部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建设坑道工事运动。截至停战,志愿军构筑大小坑道总长1250余公里,挖掘堑壕和交通壕6250公里,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果按照1立方米排开,能绕地球一周半,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我军在“三八线”阵地纵深10公里范围内,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支撑点



志愿军第15军45师134团3营8连指战员,坚守597.9高地1号坑道14昼夜

防御体系,对减少我军伤亡、保证防御稳定起到明显作用。

据统计,坑道修成以前,敌平均发射40发至60发炮弹杀伤我军1人,坑道建成后,敌平均发射660发炮弹,才能杀伤我军1人。正因为我军创造性地将坑道作业发展到极致,逐渐抵消了美军的武器装备优势,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南北地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报告中沮丧地写道:“我们用目前这种战法,至少要用20年光景才能打到鸭绿江。”

打出攻防自如的灵活。利用坑道避敌锋锐、有效反击,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重要战术之一。进攻战中,志愿军可依托坑道作为进攻出发阵地,将兵力、兵器隐蔽集结于前沿阵地坑道,缩短冲击距离,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攻势防御、进攻作战的突然性和主动性;防御战中,即使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志愿军也可依托坑道作为坚守防御工事和反击出发基地,有效躲避敌航空兵、炮兵、装甲兵火力杀伤,还能从坑道内以小分队主动出击,不断扰乱敌地表的敌人,破坏其工事。

坑道是固定的,志愿军的战术是灵活的。针对敌进攻时的兵力规模、攻击强度、前进位置,志愿军结合敌火力预备、步兵攻击、占领阵地、突入阵地等不同情况,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坑道攻防战法。比如,1952年4月间联合国军以小部队向志愿军阵地攻击60余次,曾一度占领不少表面阵地,但每到夜幕降临,志愿军就会从坑道中出击,给美军迎头痛击。从1952年秋开始,志愿军转为依托坑道工事主动向“联合国军”进攻。9月至10月间,志愿军先后对“联合国军”连、排防御阵地及个别营的防御阵地共60个目标发起全线战术反击,成功占领17处阵地。1953年5月至7月,志愿军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进攻目标发展到“联合国军”的营、团阵地和师防御地域。在整个阵地战时期,我志愿军凭借坚固的坑道堡垒,在一点或数点上与敌

反复争夺,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歼敌数量几乎为前5次战役歼敌总数的3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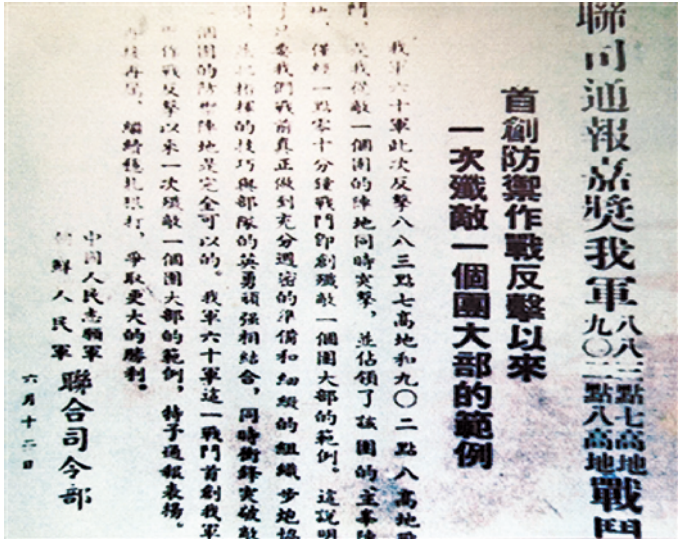
守出不胜不休的顽强。坑道战既是战术战法的创新,也是战斗意志的较量。在美军持续不停的炮击和空袭下,志愿军部队有时要在黑暗的坑道内隐蔽坚守数周时间,照明、给水、给养、救护等都是极大的难题。为打赢坑道作战,志愿军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力、凝聚力、意志力。后勤部队竭力为坑道部队提供补给,许多运送人员为此付出生命。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在精神上鼓舞了坑道内的部队,坚定了志愿军将士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在最激烈的上甘岭战役中,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敌军以300门火炮、27辆坦克和40架飞机,猛攻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6发。猛烈的火力很快将高地表面的野战工事摧毁殆尽,而隐藏在坑道中的志愿军守备部队大多安然无恙。当敌弹幕射击延伸后,志愿军迅速占领阵地,阻击冲上来的敌军。

为消灭地下坑道的志愿军,敌军采取了种种毒辣手段:对坑道进行定向爆破,向坑道内施放毒气,用喷火器焚烧坑道入口,用迫击炮吊射坑道口,用铁丝网缠困堵塞道口,从坑道顶部雷眼装药爆破等。不过这些办法,在完备的坑道工事和英勇无畏的志愿军面前均无法奏效。有时敌人挖开口子,我军夜间就顺着敌人开掘的口子杀出去。据战史记载,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部队依托两个高地北山上的48条坑道,打退“联合国军”营以上兵力进攻25次、营以下兵力进攻650余次,歼敌2.5万余人,最终守住了阵地。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承认,即使使用战术核武器也无法突破志愿军的防御。



“联司”主要指挥员



“中朝联合司令部”通报嘉奖第60军文件影印件

两国协同 共御外敌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始末

■凡华锋 谢 引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鲜为人知的是,联合司令部从开始酝酿到最终成立,经过了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当日,美陆军第1军已占领平壤,美军和南朝鲜军以部分兵力对付朝鲜人民军北撤部队和游击队,并集中4个军、10个师、1个旅和1个空降团,于东西两线,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推进。此时,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可调动的兵力已不足4个师,其余部队都被分割打散、各自为战。在此形势下,因没有联合指挥与协同作战的机制,志愿军无法取得朝鲜人民军的支援,只能依靠自身扭转战局。

在志愿军人参战前,1950年10月上旬,周恩来曾赴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商议了中朝联合作战及建立联合指挥机构的问题,但斯大林未予明确答复。10月21日,就在我出兵朝鲜后第3天,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向朝

鲜首相金日成提出,希望金日成率领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搬至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随时协商作战指挥及其他重大事宜。金日成决意派内务朴相一禹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负责两军协调。10月25日,朴一禹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然而,由于未成立联合指挥机构负责两军的协调工作,在第一次战役中,因任务区分不明、沟通乏力,多次发生因朝鲜军民撤退导致志愿军行军受阻、朝鲜人民军坦克误击志愿军等事件。此外,后勤物资运输和保障也出现不少混乱。后,志愿军意识到,无论是战略筹划还是战役实施,都迫切需要组建联合作战机构、进行统一指挥。

第二次战役期间,随着敌后朝鲜人民军与志愿军会师,其北方部队也基本整训完毕,两军联合作战问题更加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建议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一

个三人作战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事务并制定与作战有关的现行政策。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征求其对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的意见,并转述彭德怀的建议。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

12月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双方商定成立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两军作战及前线活动,但不对外公开。8日,周恩来起草《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在征得金日成同意后,该协议成为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重要依据。12月上旬,志愿军与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合司令部”或“联司”)正式成立,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方面由金雄、朴一禹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1951年初,增补邓华为“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7月,朝鲜方面以崔庸健接替金雄任副司令员,1953年2月又接替朴一禹为“联司”的工作。

自1950年12月中旬起,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实施联合作战。1951年1月,两军突破敌“三八线”既设阵地,粉碎了敌整军再战的企图,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赢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

在第四次战役中,两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作战,最终毙伤俘敌7.8万人,为第五次战役创造有利条件。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两军共毙伤俘敌8.2万人,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此外,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中朝两军先后赢得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战役、1953年春夏反击作战准备等各类局部战役的胜利,并在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后,将战线彻底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最终促成了停战。



链接历史

原典

《百战奇略》气战篇原文为:夫将之所以战者,兵也;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盛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气,则不可太频,太频则气易衰;不可太远,太远则力易竭。须度敌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内,乃可以鼓,令士卒进战。彼衰我盛,败之必矣。法《(尉缭子·战威第四》)曰:“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气战篇认为,将领作战靠士兵,士兵作战靠士气,士气旺盛靠鼓动。鼓动部队士气不可太频,太频则士气容易衰减;也不可太远,太远则士气容易衰竭。必须在敌距我六七十步以内,才可击鼓,指挥士卒进攻。在敌人士气衰落,我军士气旺盛的情况下作战,打败敌人是必定无疑的。诚如古代兵法所说:士气高昂就投入战斗,士气低落就避敌退走。

战例

春秋时期,齐鲁两国交战于长勺(今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东北)。鲁庄公刚要出击,被曹刖制止,待齐军三通鼓罢,曹刖才请鲁庄公令部队发起进攻,大败齐军。曹刖解释道,打仗靠勇气,齐军一次击鼓可以振作士气,再次击鼓士气衰落,三次击鼓士气就枯竭了。敌士气枯竭而我军士气旺盛,所以能够取胜。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和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4.5万余人沿平汉路北犯。为粉碎敌进犯,党中央决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45年10月21日,邯郸战役打响,至11月2日胜利结束,歼敌2.3万余人,粉碎了敌沿平汉路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役,高树勋于10月30日率部近万人起义,对敌军心士气打击很大。

计谋分析

师出正义,军纪严明。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部队士气的高低盛衰,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使己方部队保持高昂斗志,历来是军事家的重要课题。克劳塞维茨说:“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在过去各个时期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今后仍会这样。”然而,军队士气是否高涨,官兵是否具有奋勇杀敌的顽强意志,从根本上讲,是由战争的性质、目的决定的。为正义事业而战,官兵必定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军心士气才能持续高涨。同时要看到,部队的“气”不是凭空而来,广大官兵的血性斗志需要日常严格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并由严明的军纪保证。鲁国大败齐军,采取后发制人和敌疲我打的正确作战方针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处于防御一方的鲁国,在政治上取得本国民众的全力支持才是取胜的前提。

把握时机,合理鼓“气”。作为怒战篇的姊妹篇,气战篇的“气”指的是锐气和旺盛的斗志,更侧重于两军相争时己方官兵的必胜信心和气势。部队的士气不是天然存在的,要靠鼓动和激励,因此掌握鼓动、激励士气的艺术是每个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同时,“气”作为一种精神因素,是官兵思想和心态不断变化的反映。既然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就必须把握鼓“气”的时机。孙武曾说:“进其锐气,击其惰归。”这就是说,抓住“彼衰我盛”这个时机,从气势上对敌进行全面瓦解,就是气战所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也应当是气战的最高境界。高树勋起义虽是个体事件,但作为哲学家兼军事战

略家的毛泽东独具慧眼,敏锐意识到这一事件对瓦解国民党军战斗意志所起的重要作用。高树勋起义两个月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明确指出要“开展高树勋运动”。这一运动无疑对国民党军队起到“釜底抽薪”的奇效,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共有近170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或投诚。

软硬实力,辩证分析。必须强调的是,士气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士气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官兵潜能,使战斗力最大化,但气战终究不是一种攻城拔寨、斩将杀敌的计谋。战争区别于其他所有实践活动,以追求“势”的变化为最高境界。战争的“势”不仅仅是对官兵战斗意志和作风的检验,最终还是对双方军事实力的考验,必须统筹二者关系。实际上,军事实力与“气”相互辩证,强大的硬实力是军队打胜仗的坚实基础,而胜利往往是提升军心士气最好的兴奋剂。反之,使用 and 把握好部队之“气”,又能于无形中提升军队实力。因此,在对气战的运用中,既应重视“气”,也不可以偏概全,片面强调“气”而忽略军事实力的发展,否则容易造成外强中干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骑兵的士气不可谓不高涨,冲锋不可谓不勇敢,但面对纳粹德军的坦克,无疑是螳臂当车。高树勋起义的背后,则是以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牢牢掌握邯郸战场主动权为根本前提。毛泽东在回忆高树勋起义时曾感慨道:“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



位于河北省安州市伯延镇元宝广场的高树勋起义纪念馆